

国学经典
丛书

名家注评本

孟子

徐洪兴
注评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国学经典
丛书

名家注评本

孟子

徐洪兴 注评



长江出版社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孟子 / 徐洪兴注评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5.7

（国学经典丛书）

ISBN 978-7-5354-8035-4

I. ①孟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儒家②《孟子》—注释
IV. ①B222.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09430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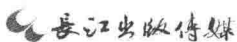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：程华清 周 聪

责任校对：陈 琪

封面设计：徐慧芳

责任印制：左 怡 邱 莉

出版：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：430070

发行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：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：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：8.375 插页：4 页

版次：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182 千字

定价：29.00 元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27—87679308 87679310）

（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）

总序

郭齐勇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

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“今人率言‘革新’，然革新固当知旧”。对现代人尤其是青年一代来说，缺乏的也许不是所谓的“革新力量”，而是“知旧”，也即对传统的了解。

中国文化传统的源头，都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。从先秦的《诗经》《易经》，晚周诸子，前四史与《资治通鉴》，骚体诗、汉乐府和辞赋，六朝骈文，直到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和明清小说，在传统经典这条源远流长的巨川大河中，流淌着多少滋养着我们精神的养分和元气！

《说文解字》上说“经”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编织排列，《广韵》上说“典”是一种法、一种规则。经与典交织运作，演绎中国文化的风貌，制约着我们的日常行为规范、生活秩序。中国文化的基调，总体上是倾向于人间的，是关心人生、参与人生、反映人生的，当然也是指导人生的。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，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，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，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，还是先民传唱的歌曲，屈原的忧患行吟，都洋溢着强烈的平民性格、人伦大爱、家国情怀、理想境界。尤其是四书五经，更是中国人的常经、常道。这些对当下中国人治国理政，建构健康



人格，铸造民族精魂都具有重要意义。经典是当代人增长生命智慧的源头活水！

长江文艺出版社历来重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及普及，近年来更在阐释传统经典、传承核心文化价值，建构文化认同的大纛下努力向中国古典文化的宝库掘进。他们欲推出《国学经典丛书》，殊为可喜。

怎么样推广这些传统文化经典呢？

古代经典和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及趣味本来有一定差距，如果再板起面孔、高高在上，只会让现代读者望而生畏。当然，经典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一味将它鸡汤化、庸俗化、功利化，也会让它变味。最好的办法就是，既忠实于经典的原汁原味，又方便读者读懂经典，易于接受。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，《国学经典丛书》首先是以原典为主，尊重原典，呈现原典。同时又照顾现实需要，为现代读者阅读经典扫除障碍，对经典作必要的字词义的疏通。这些必要精到的疏通，给了现代读者一把打开经典大门的钥匙，开启了现代读者与古圣先贤神交的窗口。

放眼当下出版界，传统文化出版物鱼目混珠、泥沙俱下，诸多出版商打着传承古典文化的旗号，曲解经典，对现代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认知传承经典起了误导作用。有鉴于此，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《国学经典丛书》特别注重版本的选取。这套丛书30个品种当中，大多数择取了当前国内已经出版过的优秀版本，是请相关领域的名家、专业人士重新梳理的。这些版本在尊重原典的前提下同时兼顾其普及性，希望读者能有一次轻松愉悦的古典之旅。

种种原因，这套丛书必然会有缺点和疏漏，祈望方家指正。



导 言

在旧时的中国，尤其是宋代以后，孟子可以说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这大概还得拜南宋后出现的发蒙读物《三字经》所赐。《三字经》劈头就讲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这可是孟子的意思。第二句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，那才是孔子的话。可见，从那时起，孟子的地位并不比孔子低。这里，我们就先来讲讲孟子这个人、《孟子》这部书吧。

一、孟子其人其书

孟子名轲，生活在动荡的战国中期，邹（今山东省邹城市）人。关于孟子的生卒之年，学术界历来有许多说法。据统计，光孟子的生年之说就有九种之多，然后又由于各种推算的不同，以及对他寿数的说法不同，可衍生出更多关于孟子卒年之说。这里我们仅取一种相对通行的说法，即孟子生于约公元前 372 年，卒于约公元前 289 年。



古人除名之外还应有字。关于孟子的字，《孟子》书中并未提到过，司马迁在其《史记》中也无记载。到东汉末的赵岐，他在注解《孟子》时就更不清楚了，只能说孟子“名柯，字则未闻也”（《孟子题辞》）。但从魏晋开始，突然冒出孟子字“子车”、“子舆”或“子居”等多种说法。尽管煞有介事，但证据却绝无，且其中还有被学界公认的“伪书”，因此不足凭信。

孟子的先祖是谁？《孟子》七篇中没有说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及其他与孟子同时代或稍晚的历史文献中也无记载。东汉赵岐在《孟子题辞》中说：“或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。”“或曰”之说表明赵岐也不能完全确定，但学界一般都沿用了此说，即认为相传孟子的远祖是鲁国的贵族孟孙氏，后来家道中落，从鲁国迁居邹国。据说孟子幼年丧父，与寡母相依为命，孟母对孟子的教养有道。从《孟子》书中我们知道，孟子对其母亲非常孝敬，以致因葬母时棺槨衣衾太好而遭人非议。从西汉开始，孟母开始成为世所公认的母仪典范，西汉时的文献《烈女传》、《韩诗外传》中记有“孟母三迁”、“孟母断织”、“东家杀豚”等故事，这些故事的真实性虽无从考证，但不妨其成为流传千古的美谈。

孟子的师承关系也不太清楚。司马迁说他“受业于子思之门人”，但“子思门人”是哪位？缺乏进一步的说明。从中唐韩愈开始，不少儒家学者都说孟子的老师是子思，子思的老师是曾参，此说后来流传甚广，但没有确切的证据，所以也有学者并不认可。根据孟子自己的说法：“予未得为孔子之徒，予私淑诸人也。”（《离娄下》）^①这里的“人”是谁？我们不知道，大概是“子思之门人”吧？而所谓“私淑”，按一般的理解，是指敬仰某人学问但未能登堂入室成为其弟子的说法。因此，孟子直接的老

^① 按：“本书”中凡引《孟子》语者，书名省略，仅列篇名。

师是谁，至今无法断定。

孟子的生平经历，与其崇敬的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，这主要表现在：一、与孔子一样，他也长期开门授徒，即使在游历诸国时，学生们还是伴随其左右；二、与孔子一样，他也有强烈的从政愿望，希望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，因此中年开始他也周游列国游说，而“仆仆于道路”的结果和孔子也差不多，没有哪位国君真正愿意接受其政治主张；三、与孔子一样，晚年时孟子也退居故里，与学生一起讨论学问。这里我简单叙述一下孟子上三方面的情况：

孟子曾说过：“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。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一乐也；仰不愧于天，俯不忤于地，二乐也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乐也。君子有三乐，而王天下不与存焉！”（《尽心上》）孟子用先秦特有的强调句式即前后的复句，来强调从事教育之“乐”，说明他把从事教育看得比称王天下还要有价值，看来他确实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获得过很大的慰藉。由于长期从事教育，孟子的学生尽管没有孔子“弟子三千，贤人七十有二”那么多，但可以想见也一定不少。如他在游历齐国时，已经是“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，这所“从”的“数百人”，都是他的学生。只是由于没有类似司马迁为孔子学生专作的《仲尼弟子列传》这种比较可信的资料，所以我们对孟子学生的情况了解不多。现在能确定的也仅有乐正子、万章、公孙丑、公都子、陈臻、充虞、咸丘蒙、陈代、彭更、屋庐子、桃应、徐辟、孟仲子等十几人，他们都见诸《孟子》书中。后世有学者在这方面做过不少研究和考证，但其结论未被学界普遍接受，而所增人数也实在有限，所以不提也罢。

大致说来，孟子是四十来岁开始其政治游历的。在此之前，他或许已有了短暂在邹从政的经历。孟子的游历，到过齐、宋、

薛、鲁、滕、梁（魏）等国，期间还曾返回过邹国。孟子在各国的时间有长有短，有的仅是路过，有的则去过数次，旅居时间也较长。其中，去过次数最多、旅居时间最长的是齐国。

至于孟子游历诸国所提的政治主张，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，那就是主张“王道”而反对“霸道”，反复申论“仁政”的重要性、必要性和可行性。孟子在其游说中提出：“仁政”源于先王的“不忍人之心”，而从正经界、划井田开始，其中包括了“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深耕易耨”等内容；他认为这可以使老百姓有一定的“恒产”（土地），能安居乐业，老人们能衣帛食肉，进而再使年青人受到道德教育；在孟子的“仁政”思想中，“民”具有关键意义，其地位高于国家，更高于君王，所以君王必须能保民、安民、养民和惠民；如果能做到这样，那么即使是弱国、小国，国君即使是好勇、好货、好色之徒，即使用木棒为武器，也可以打败秦、楚这种有“坚甲利兵”的强国、大国；就可以使其军队成为“王者之师”，别国的人民就会“箪食壶浆以迎王师”。

孟子在诸国颇受各国君主的优礼，明显要比当年的孔子来得幸运，这与当时各国普遍有“礼贤下士”的风气有很大关系。孟子在游说那些诸侯时，常常慷慨陈词，咄咄逼人，摆出一副“说大人则藐之”的架势，经常弄得那些国君狼狈不堪，只能“顾左右而言他”。但当时的君主都是一些讲求实际功利的人，他们都崇尚霸道，大国热衷于如何攻伐、兼并，小国则关心如何在夹缝中搞平衡、求生存。所以孟子那些陈意甚高的政治理想，在这些国君眼里就不能不是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，就如司马迁所说的：“当是之时，秦用商君，富国强兵；楚、魏用吴起，战胜弱敌；齐威王、宣王用孙子、田忌之徒，而诸侯东面朝齐。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，以攻伐为贤，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”因此，孟子游说的结局也和孔子一样——到处碰壁。



经过这么多年的东奔西走、四处碰壁后，孟子最终明白，那些诸侯国君主虽然在“重士”的风气下对自己很客气，但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自己的政治主张，他的“王道”、“仁政”理想是难以实现了。到了这种境地，他又一次以孔子为榜样，放弃从政愿望，回归故里，与弟子们一起讲学论道，希望通过这种形式，把自己的思想传于后世。于是，就有了我们今天还能读到的《孟子》这部著作。

有关《孟子》这部书的作者、篇数，也有不同意见。

关于作者，按司马迁的说法，主要是由孟子自著，而其弟子万章、公孙丑等参与其事；按赵岐、朱熹、焦循等历代研究者的观点，认为是孟子自著；而韩愈、苏辙、晁公武等学者的意见则认为弟子万章、公孙丑之徒的追记。有关具体的说法，这里就无须赘引了。就目前学术界的一般看法，较多是采取司马迁的说法。

至于《孟子》的篇数，司马迁说“作《孟子》七篇”，可《汉书·艺文志》却著录“《孟子》十一篇”。现存最早《孟子》注解的作者赵岐，分《孟子》为“内书”七篇，“外书”四篇，并提出：《性善辩》、《文说》、《孝经》、《为政》四篇“外书”，“其文不能宏深，不与内篇相似，似非《孟子》本真，后世依放而托也”。所以他不予作注。这以后，这四篇《外书》就渐渐亡佚了。今存的“外书”，学术界公认为是明末姚士粦的伪作，为清代吴骞所刊行，故不能列入《孟子》。

今存的《孟子》一书共七篇，篇目依次是：梁惠王、公孙丑、滕文公、离娄、万章、告子、尽心。每篇各分上下，共261章（有的分为260章）。一般认为，《孟子》的篇名取自每篇首章中数字，没有什么特定含义。篇目的排列顺序，按赵岐《孟子篇叙》的说法则有特定含义：

孟子以为圣王之盛，惟有尧舜。尧舜之道，仁义为上，故以梁惠王问利国，对以仁义，为首篇也。

仁义根心，然后可以大行其政，故次之以公孙丑问管、晏之政，答以曾西之所羞也。

政莫美于复古之道也，滕文公乐复古，故次之以文公为世子，始有从善思礼之心也。

奉礼之谓明，明莫甚于离娄，故次之以离娄之明也。

明者当明其行，行莫大于孝，故次以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也。

孝道之本，在于情性，故次以告子论情性也。

情性在内而主于心，故次以尽心也；尽己之心，与天道通，道之极也，是以终于尽心也。

这实际只是赵岐个人研读《孟子》一书的心得，谓之一家之言可矣。

二、孟子升格过程

历史上有一个通行观点：孔子以后“儒分为八”，到战国中后期演变为两支。一支始于子夏，讲文献之学，数传而至荀子；一支始于曾参，究义理之学，二传而至孟子。以后，荀子便是汉代经学家所尊信的大部分儒家经传的先师，孟子则成为两宋起道学家所崇敬的不祧之祖。儒家内部这两派的分野，也就是所谓“学统”与“道统”之别，“汉学”与“宋学”之分。对这个说法，学术界的意见历来不同，这里就不必去细究了。此说至少有一点不错，即孟子其人其书的重要性确实是从唐宋之际开始凸显

的。这以后，“孔孟之道”几乎就成了儒家思想的代名词。

孟子去世以后，由他为代表的儒家中之一派似无太大的发展。到了战国的晚期，由荀子代表的一派渐渐崭露头角。荀子稍晚于孟子，他长期居齐，因学问博洽，曾三次出任“稷下学宫”的“祭酒”。他精通多种儒家经典，被认为是儒家经学早期传授中十分重要的人物。荀子在其《非十二子》中，对子思、孟子一派曾有严厉的批评，说他们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，犹然而材剧志大，闻见杂博。案往旧造说，谓之‘五行’，甚僻违而无类，幽隐而无说，闭约而无解。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：‘此真先君子之言也’”。荀子的批评只能说是当时儒家内部的派别斗争。

秦汉以降一直到两宋以前，孟子地位一直不高。孟子其人，只被视为一般的儒家学者；孟子其书，只能归入“子部”一类。在官私文献中，多是“周孔”或“孔颜”并提，鲜见有“孔孟”合称的。令人注意的是，东汉赵岐在注解《孟子》时，曾把孟子尊为“亚圣”，还提到西汉文帝时设置过《孟子》的“传记博士”。可“亚圣”之名，未被宋朝以前的官方认可过；而“传记博士”即使存在过也为时很短，且不说此事因不见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记载而颇启后人疑窦。当时，也有人批评孟子，最典型的应该是东汉的王充，他在《论衡》中专立了《刺孟》一篇，列举了孟子八个方面加以批评。

历史进入唐代，唐高祖、太宗、高宗三朝，争论国子学当祭“周孔”还是“孔颜”时；唐太宗增加从左丘明到范宁二十二位儒者从祀孔庙时；唐玄宗封颜渊为“亚圣”和“兖国公”、封“孔门十哲”和“七十子”为侯、伯时；孟子都只字未被提及。当时科举考试的“明经”科目中只有“三礼”（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），“三传”（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）以及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这“九经”，《论语》和《孝经》则被列入

了“兼通”，而《孟子》一书没有资格入选。此时的《孟子》一书，尚不如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列子》这四部道家著作，后者在唐玄宗时被列入科举，称之为“道举”，课试与“明经”相同。

但从中唐起，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。渐渐地，孟子之名被厕于孔子之后，成为仅次于孔子的“贤人”；孟子其人被政府加封了爵号，从祀孔庙；孟子其书被增入儒经之列，悬为科举功令，不久又超越“五经”而跻身于“四书”，变成中国士人必读的官方教科书。这个变化过程，就是历史上的“孟子升格运动”^①。

变化最早出现在唐代宗的宝应二年（763年）。礼部侍郎杨绾上疏，建议把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并列为一“兼经”，增为“明经”科目。此事虽未见允，但却开启了《孟子》由“子”升“经”的先声。

真正揭开孟子升格运动序幕的是韩愈。韩愈在其《原道》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儒家的“道统”，并把孟子的名字上升到孔子之后，与那些“古圣先王”相提并论。韩愈以尊“孔孟”取代唐初的尊“孔颜”，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。如唐末的皮日休，他于唐懿宗咸通四年（863年）上书朝廷，建议将《孟子》作为国家“明经”考试的单独一经。但韩、皮之说只是少数人的呼吁，并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。

赵宋立国伊始，承袭唐代旧制，国子监所祭仍为“孔颜”，明经取士仍考“九经”。宋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，重视孟子其人其书的大概也只有柳开和孙奭比较有名。柳开受皮日休影响，十分推崇孟子，但当时的影响并不大；孙奭乃是三朝宿儒，宋真

^① 有关这个过程，其中因需考证的内容很多，注释也太多，这里一般就不具体出注了，详可参看拙作《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》一文，载于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3年第5期。

宗大中祥符年间曾受命校勘《孟子》，由此“请以孟轲书镂板”，并撰成《孟子音义》二卷。

孟子升格被重新唤起，那是在宋仁宗的庆历之际。当时，学坛上出现了一股社会思潮，而“尊孟”也成为思潮的取向之一。庆历思潮的领袖人物是范仲淹和欧阳修，他们都属于“尊孟”一派。如范仲淹发挥孟子“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”的思想，标举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宋代新儒家的理想人格风范。欧阳修推尊孟子，认为“孔子之后，唯孟子最知道”。当时最推崇孟子的应该是孙复、石介师徒，他们反复强调儒家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到孟子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这样一个圣贤相续的“道统”。他们作为北宋前期首出的经学家和教育家，在当时的学术界有很大影响。在思想界出现“尊孟”的同时，实质性“尊孟”的行动也开始出现，那就是山东兖州邹县孟庙的建立。宋仁宗景祐五年（1038年），出知兖州的孔子第三十五世孙孔道辅，在邹县建成孟庙，以公孙丑、万章等配享，还专请孙复为此事写了记文。

自庆历以后，孟子升格进入了迅速发展期，到了宋神宗的熙宁、元丰年间（1068—1085年）达到高潮。当时，二程的“洛学”、张载的“关学”及王安石的“新学”，尽管政治意见相左，却都属于“尊孟”之列的。二程兄弟及张载尊孟的言论很多，后来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之所以会把“四书”单独拿出来作“集注”，明显受到了二程和张载的影响，这方面的资料在他们的文集中随处可见，不必一一引证。我们主要来谈谈不太为人注意的王安石。

王安石一生服膺孟子，他把孟子引为自己的千古知己，把成为孟子式的人物当作人生的目标。王安石之“尊孟”是时人公认的，其弟子陆佃评价乃师曰：“言为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行则孔、孟。”

其政敌司马光也说他：“介甫于诸书无不观，而特好孟子、老子之言。”王安石之学得力于孟子，故其治《孟子》一书亦勤，有《孟子解》十四卷，今已佚。其“新学”一派中人对《孟子》也多有钻研。王安石一派由于掌握着当时的国家权力，所以在行动上将“尊孟”积极付诸实践。孟子升格此时在政治上已获得朝廷支持，请看下列进展：

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二月，《孟子》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中。

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，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经学家常秩，请立孟轲像于朝廷。

元丰六年（1083年）十月，孟子首次受到官方的封爵，诏封为“邹国公”。

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五月，官方首次批准，允许孟子配享孔庙。

政和五年（1115年），政府方面承认兖州邹县所建的孟庙，诏以乐正子配享、公孙丑以下十七人从祀。

宣和年间（1119—1125年），《孟子》一书首次被刻成石经，成为“十三经”之一。

在上列事实中，熙宁间为王安石当政期间，元丰间王安石虽已经退隐，但执政者蔡确、章惇等均为“新党”中要人，故一向诋诮王安石的朱熹，也不得不承认“孟子配享，乃荆公请之”；政和至宣和年间是蔡京当国，亦号称行“新法”。因此，王安石及其“新党”，实在堪称孟子升格运动中之功臣。

宋室南渡以后，孟子升格已进入尾声。当时，王安石“新学”尽管遭到排斥，但“尊孟”取向却为统治者全盘接受。到宋宁宗嘉定五年（1212年），国子司业刘燾奏准将朱熹的《论语孟子集注》作为官方之学。差不多同时，目录学家陈振孙撰《直斋



书录解题》，正式从目录学上把《孟子》一书由“子部”升格至“经部”。至此为止，孟子升格运动已告基本完成。到元朝的至顺元年（1330年）元文宗加封孟子为“亚圣公”，这可说是整个孟子升格运动的句号。

当然，孟子升格运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期间也出现了不少逆向的言行，即删孟、议孟、疑孟、辩孟、黜孟乃至诋孟的思想倾向。举其重要者言之：如唐末林慎思作《续孟子》，把《孟子》书中他以为不是孟子“原意”的内容加以改写。北宋庆历之际的李觏作《常语》，提出孟子不续“道统”、孟子背叛孔子、孟子怀疑六经、孟子不尊王、反对孟子的性善论、反对孟子排斥功利。李觏的学生陈次公、傅野等则附和乃师之说。北宋熙丰之际，司马光著《疑孟》，对孟子加以批评。司马光的“疑孟”，从政治上讲，目的是攻击王安石变法；从学术上讲，是因为他信奉西汉扬雄的思想。司马光的门人晁说之著《儒言》，反对孟子的态度较其师更激烈，而矛头所指也是王安石。他公开上疏，反对当时立《孟子》于学科。南宋初的郑厚作《艺圃折衷》，对孟子进行人身攻击，极尽诋骂之能事，说孟子是借孔子思想而“卖仁义”。南宋中期的叶适，在其《习学纪言序目》中，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反对当时的尊孟风气，他否定孟子一系独传“道统”，批评孟子专言心性，批评孟子不切实际的政治思想等。认为孟子身上存在着四个毛病，“开德广，语治骤，处己过，涉世疏”。

以上诸人的反孟言行，由于不适应时代潮流，所以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效果。倒是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曾掀起过一点反孟的小浪。作为绝对专制独裁的君主，朱元璋对孟子“民贵君轻”的思想十分反感，开始想罢去孟子在孔庙配享的资格，后在大臣冒死进谏下只能作罢。但他却下令删除《孟子》书中“激进”的话共八十五条，出版了一本名为《孟子节文》的书，规定科举考试不

能出现已被删掉的文字^①。但即便权倾一时的皇帝，也不能改变已深入人心的文化传统。所以，“怪胎”式的《孟子节文》一书，并没有流传开来。

三、孟子思想略述

有关孟子思想的研究，代不乏人，两宋以后尤多专家。这里只是很简略地叙述一下，有兴趣者则应该进一步去阅读那些专家之作。

这里，我把孟子思想分为四方面来讲，这仅是就其重要者而言的。

1. 人性本善

中国第一个系统提出并讨论人性问题的思想家应该就是孟子了。在孟子之前，孔子偶尔提到过人性，但并没有讲人性的善恶问题。是孟子首先提出了“人性本善”命题，以后他的理论引起了长期而热烈的争论。

就当时言，与孟子展开争辩的是告子。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，就像流水不分东西南北一样。这一观点遭到孟子激烈的批评。孟子确认，人具有一种先验的善性，他也用水来作喻：“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；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。”（《告子上》）而人性之所以本善，是因为人生来就有“善端”，就好比人生来就有四肢一样。这种“善端”不仅是先验的，也是超功利的，他说：

^① 详可参看容肇祖：《明太祖的〈孟子节文〉》，《容肇祖集》，齐鲁书社1989年版。